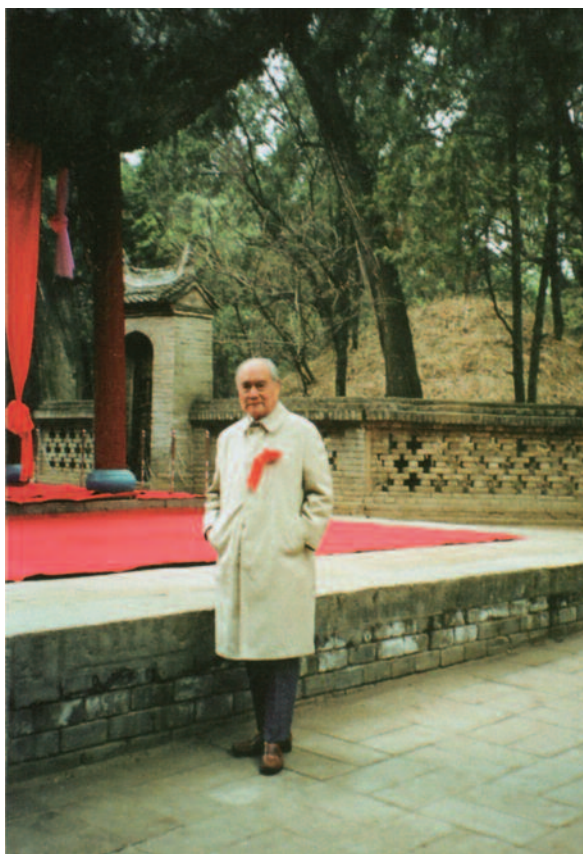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後記



一九九八年祭黃陵，何院士在黃帝陵前
引自《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4 期 2013.6

本書所收十五篇論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刊於一九六五年，最末一篇〈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完稿於二〇一〇年，前後歷時四十五年。十五篇論文中，除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及〈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兩篇外，其他十三篇都發表或完成於上世紀九〇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榮退後近二十年間，這歷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學取向的前後轉折，具有極不尋常的學術意義。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對象側重於明、清，本文是他踏足於明、清課題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國多年後首篇以中文撰寫的學術論著。〈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則梓行於一九七八年。上述兩篇論文而外，其他十三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或取徑都與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樣。除〈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一文外，其他十二篇論文探討重點明顯聚焦於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領域。

何院士在其教研究生涯的頭五十年間，盡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領域的主要考量是：如自青年階段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對部份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他也無法接受；他認為這些思想史家學問上「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甚至「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語境跳躍」，「專找『歧出之義』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證方式」，以及因堅持發揚儒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與方向」，而無視或避免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負面影響及作用，對儒家思想內涵往往過分「美化」、「淨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對各種困頓，開始自修西方經典哲學及當代哲學分析方法，並孜孜埋首於中國古代經典及其注釋，不斷思索，以期對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並對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及著作予以嚴肅的批判。從一九九一年起，他便毅然跳進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領域而義無反顧；^❶



圖一：何院士在其著作上簽名

引自《當代傑出學人文史、科技公開演講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04）

❶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頁407-408, 445-452。

針對上述的不正學風，〈「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一文，既為何院士進軍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吹起戰鬥號角，形成一股阻嚇力量，對學界歪風迎頭痛擊，也為接踵而來他所撰寫的多篇饒富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掀起序幕。

直至上世紀六〇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論文及專著俱以英文發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文，發表於歐、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及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等，影響深遠，不以研治中國歷史者為限，而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二書更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基石之作，不單在國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極具重要意義。前書更是二十世紀華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國《倫敦泰晤士報》（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論論及的書籍，西方重要歷史及漢學期刊對該書的書評即多達二十餘篇；後書則被全美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評選為整個史學範圍內最重要的七百五十部著作之一。從去國直到〈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問世前，他沒有用中文撰寫過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領域進軍的歷程中，何院士作出一個重大決定：這類研究的一系列論著只用中文撰寫。他的權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華語世界讀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陸），更由於年事日高，自覺有節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創意義，遲早還是可以在西方漢學界產生影響的。」^②

作為大史學家，何院士並不以考證為滿足，蓋他堅持「考證是治史必要的方法與手段，治史最終目的是綜合。」唯就收進本書的相關論文所見，除〈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一文，基本上為大綜合及大詮釋之作外，其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與前期相較，明顯看出確實在考證方面著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一文，他更毫不諱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題小作法。」何院士強調考證的基本原則及方法繫於常識和邏輯，突破性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③事實上，何院士對多樣史料的嚴格考證、甄別，以及平衡合理的運用，無不充分反映於書中相關論文中。

② 全上，頁452。按：何院士近年唯一一篇英文論文是為駁斥日裔女史家 Evelyn Sakakida Rawski 於一九九六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卸職演說〈清史再反思〉而作。參見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123-155.

③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489。

何院士早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以幾近竭澤而漁蒐羅史料見長，取徑較偏重於宏觀綜合。他完成博士論文後，於一九五四年發表的第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④即引用罕見的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及鹽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代以降中國人口研究》及《明清社會史論》時，數年間翻遍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單是玉蜀黍一項，〈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舉的俗名便多達 65 個，就是何院士從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近三千種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國大陸上世紀九〇年代大規模從國內外翻印各種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為海內外難得一見的孤本秘笈。^⑤近時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雖受益於近三十年來山東臨沂出土的大量兵書、殘簡，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老子》和其他古籍的發現，但史料方面主要還是取資於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難得的是，何院士卻說出絕大多數學者不能說的話，發前人之所未發，難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時更高，唯成果及業績則不遑多讓，因這類課題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並不取決於史料蒐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決於方法與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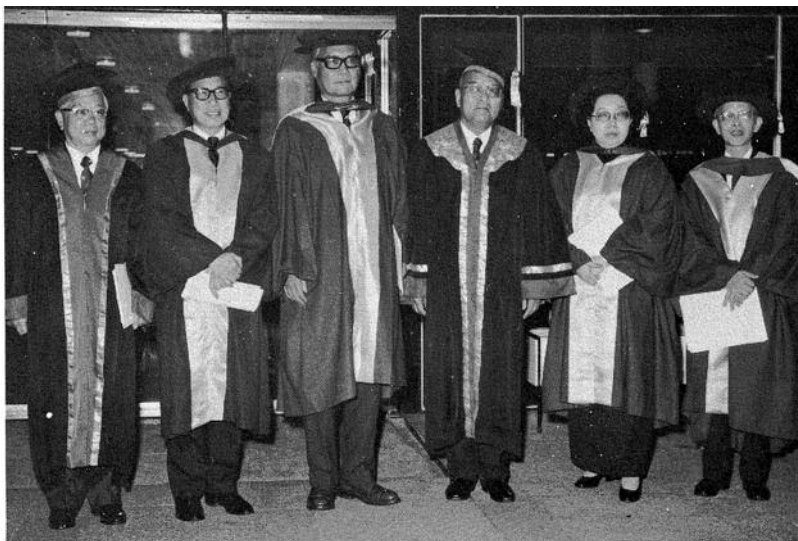
何院士決非尋常的歷史學家。他一向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認為浪費時間及精力。在人文歷史領域內，連續鑽研基本大課題的難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長而卓越的學術生涯中，再三向高難度挑戰，將國史研究帶進一個累累碩果的紀元，對重新描繪歷史面貌貢獻良多。本書所收論文中，北魏洛陽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課題；美洲作物的討論對象，就是中國近千年以降，開始於十六世紀，美洲四種農作物，花生、甘藷、玉蜀黍及馬鈴薯傳入的第二個長期糧食生產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上困惑歷代學人的最為關鍵的大問題，也是最為頑強難攻的堡壘；即便是這基本性關鍵課題中所要澄清的枝節問題，如太史公司馬遷行年考，本身便是國史上的第一等專題。至於以堅實的新考古及文獻資料，闡明產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環境和物資基礎，初步證明恩格斯影響深遠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三大人類歷史演進階段，並不適用於古代中國，進而考釋華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傳統及當代中國發揮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已故講座教授鄒儼認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來最重要的論文」的〈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一文，^⑥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課題。

^④ “The Salt Merchant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 (1954).

^⑤ 即便上世紀五〇年代，東西冷戰方殷，中國大陸對外鎖國，何院士依然致書北京圖書館，請其代為借取所需史料。「北京圖書館轉來何炳棣自舊古會〔Vancouver〕來書，欲借《永憲錄》。」「北京圖書館專人持函取《永憲錄》去，頗詫其輕率，然不能不予之。」分別見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1075，1958 年 3 月 28 日條；頁 1076，1958 年 3 月 31 日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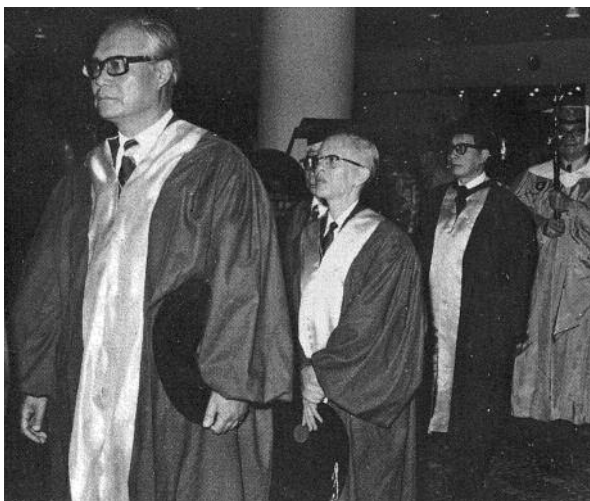
^⑥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453。

(From left to right)
Mr. T.C. Cheng,
Sir Yuet-Keung Kan,
Prof. Ping-ti Ho,
Vice-Chancellor
C.M. Li,
Dr. Aw Sian, and
Prof. D.C. Lau



圖二：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何院士（左三）榮獲香港中文大學頒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引自《中文大學校刊》（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學）1975 冬：4

因當代學人對上述部份相關課題的著述堪稱汗牛充棟或已有相當業績，發前人未發之覆為極高難度的挑戰；何院士因早年學習西洋史時便已養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歷時（diachronic）兩種比較的习惯，故能拓展歷史視野，啟發新思路，治學勇中有慎，勝義紛陳，探驪得珠，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每能帶給讀者意外的驚喜。難得的是他所討論的都是國史上的重大課題，卻能從大處著眼，掌握主要線索脈絡，而不拘泥於枝節，見樹不見林，致為史料淹沒；他雖旁徵博引史料，但決不迷信史料，不單考釋史實，也考釋史料。他以合理適中的篇幅把紛亂如麻的史實清釐還原，深得史家要刪割愛之旨。可以這樣說，書中大多數論文，專就方法論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證的極端應用，誤以為治學態度嚴謹，而致方法失之偏頗的〈「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實上都是史學方法課程（特別是內考證部分）的理想實習資料，為後學指引迷津，好學深思者，定可從其論著中學到真正的史學方法。



圖三：見《中文大學校刊》（英文版）1975 冬：4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文中，何院士縝密周詳辨正一九五四年閻文儒考古實測報告與其附圖，以及上世紀三〇年代加拿大聯合教會駐河南教士 Bishop W.C. White 論著中最早繪出的漢魏洛陽城地圖的正誤外，並縱橫交錯，先從比較觀點及世界史視野，直指唐代長安城垣所佔面積（逾三十方哩）遠大於西、東羅馬帝國兩個京城（羅馬及君士坦丁堡，各僅九方哩）及十三世紀末倫敦（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響唐代長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陽面積及規劃。這兩都城規模宏大，「不特在我國歷代帝都之上，且為工業革命前人類史上所僅見。」接著經歷時比較，從中國都市長期演變中，點出北魏洛陽城的中軸意義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發現：北魏洛陽坊里制主要特徵是四郭坊里之間的劃分大致以社會階級為依據，這種「寺署有別，四民異居」的規劃大有別於西漢長安宮室、衙署、市廛、民居雜處，正反映出兩個時代的社會觀念及現象；唐、宋以降，隨著經濟發展，階級身份日趨流動，汴京「里巷之間，第邸同閭市毗鄰，仕宦與庶萬肩擦，身分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遺意盡失。」故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Arthur F. Wright 致函何院士，盛讚此文「考證細密，敘事有條有理，描寫洛都生活文筆生動。」^⑦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一文中，何院士對儒家學說的要旨作了嚴肅的新反思。對華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為深刻的體會及反思後，以張載〈西銘〉為視窗，上溯至《易傳》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學宗師，通過對史料的精讀及仔細推敲，盡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維，加以考釋評估，得出與絕大多數當代思想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結論——「秦漢以降的儒家的宇宙本體論是宗法模式的」；張載〈西銘〉冠冕堂皇詞語的深層意義實質是為專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辯護。

書中所收一系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文中的一大特色為，既有微觀的細緻考證，復有宏觀的通識綜合，考證處處與綜合相結合。因涉及的都是基本大課題，何院士極重視論證的積累，務必搜羅大量多樣的相關史料作為基礎，決不以孤立證據立論。〈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文中，他深入鑽研西漢官制後，重新鑒定《史記》與其他古籍內的相關數據，通過探索太史公父子的師承，抽絲剝繭地窮究老子譜系，以解決這一撲溯千古，重要而棘手的課題；何院士並在細讀《史記·太史公自序》後，敏銳地觀察到王國維極具影響力的〈太史公行年考〉論證的嚴重失當；司馬遷生年應為公元前三五年，而非王氏所主張的前一四五年。筆者感到文中論述司馬談為其早慧愛子教育用心之苦古今罕見，相當程度上或為何院士對其尊人壽權先生為他早期教育所擬定的方針的強烈感情投射。^⑧

⑦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 374。

⑧ 有關何院士尊人為他早期教育所作的規劃，參考全上書，頁 7-11, 63。

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及〈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兩篇論文中，通過文字、專詞、語義、稱謂、思想內涵、命題與反命題先後順序等多維度縝密論證，何院士得出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人所未言的結論，並為重新考訂、分析、權衡與界定先秦、兩漢政治哲學思想的「軸心」奠定堅實的基礎。何院士認定《孫子兵法》成書早於《論語》至少一個世紀，實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經《孫子兵法》、《老子》、早期的儒、墨兩家的多邊相互驗證，他發現《老子》在體用及思辨方法上都與《孫子》具有特殊的親緣關係：人類史上《孫子》是最先以「行為主義」心理學原則治國；淡化、緣飾《孫子》的坦白冷酷，愚民語句最為微妙成功者便是《老子》，輩份的正確定位應是《孫》為《老》祖。

值得注意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一文，是何院士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文字組主任劉雨合撰，也是何院士生平唯一與他人合撰的論著。^⑨何院士一向認為西周年代考訂是研治西周史的學人絕不應迴避的嚴肅課題，也是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關注。針對上世紀九〇年代末葉起在中國大陸進行，以釐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為目標的大型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其中所呈現方法論及資料運用不當或嚴謹度不足而衍生的問題，文中提出有力的批判及質疑。何院士和劉雨對斷代工程攻關所取得的業績，特別是在測年技術方面，使用先進進口設備，測量精敏度極高的加速器質譜法（簡稱 AMS），與其他技術如樹輪校正曲線配合，一九九七年對陝西澧西遺址發掘出土的木炭、獸骨、炭化小米等標本進行測試，並參照晚商賓組卜辭中的五次年代月食進行核對，對過去各種偏頗主觀說法作大規模刪汰工作，將克商年代範圍限定在公元前一〇五〇～前一〇二〇年間，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們對斷代工程據傳世文獻如《國語》、《尚書·武成》及《逸周書·世俘解》和出土數據運用方法的失當，特別是將古本《竹書紀年》肆意肢解後，所選出的武王克商確切年代為前一〇四六年之說，則一一展開有力攻擊。何院士和劉雨針對斷代工程誤信《國語》伶州鳩所稱周武王伐紂時「歲在鶉火」之說，經縝密論證後，對其中迷惑作如下澄清：「伶州鳩這段話所記的星象詞句是典型的星象家的星占說，用春秋時代的人伶州鳩的口講出戰國人編造的故事來，這本身就近於胡言亂語。他所述的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只能是推算出來的。」至於《尚書·武成》及

⑨ 按：何院士在這領域最早的成果是四十年前發表的〈西周年代平議〉，《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1973）。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後，何教授尚發表〈古本《竹書紀年》與夏商周年代〉一文，載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可惜這兩篇論著沒有收進本書。讀者宜一併參看，庶能對何院士在這領域的業績及成果有更全面及完整的認知。

《逸周書·世俘解》，他們以現存這兩篇文獻，已大致被公認是合二而一的，但兩者的干支曆日、月相卻頗有不同，疑點重重；他們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貿然使用這些曆日、月相材料去推論伐商年」，「是不慎重，方法論上看也是十分危險的。」何院士和劉雨認為斷代工程沒有充分利用古本《竹書紀年》這樣在年代學上史料價值至高的史籍，是研究一大敗筆。他們透過以古本《竹書紀年》與文獻（特別是將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上推至西周初及其世系來源有自的《史記·魯周公世家》）和天文現象（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夏、商、周總積年，合於中國古代的「極端天象」〔「禹時五星聚」〕；該天象經中、美的天算專家測算發生於前一九五三年，約夏禹晚年）互證後，得出「『武王克商年』無須捨近求遠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書紀年》的公元前1927年」的結論。何院士和參與斷代工程，並對西周史及金文資料至為熟悉的古文字學者劉雨教授合作，提出既有破，又有立，非常科學的精闢探析，可謂相得益彰。本文實為史學方法中內考證不可多得的最佳範例。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一文中，何院士以《莊子·天下》篇首中幾個關鍵詞，尤其是「道術」作切入點，探討百家爭鳴前，先秦哲學思想重心及其基本關懷。他發現「道術」一詞，並非源於道家，而是初見於《墨子·尚賢上》；《墨子》所言的道術，根本為最現實功利的君王統治術。何院士一本嚴謹治學態度，檢視《論語·子路》、《鶡冠子·天則》及《淮南子·兵略訓》等文獻，察覺都出現與《墨子》論道術文義相同的文句，指出「五重文本迭合的證據已足有力地說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決不是對『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倫範疇的最現實的『君人南面之術』」。《莊子·天下》所諱言的學派為孫子；何院士認為其中癥結所在，實因孫子徹底奉行行為主義，其在應用方面對墨子的影響則為「不得不將孫武的行為主義全都加以倫理化」；這樣墨子便對行將爭鳴的百家產生一種「道義」上的威嚇。影響所及，「迫得百家的理論都不得不披上道德、清靜、無為、心性及其他形上外衣。」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一文完稿於何院士去世前兩年，其時他已年逾九十，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仍能以高度的歷史想像力對「秦墨」這一千古歷史迷團，撥雲指日，提出縝密而具說服力的解釋。筆者認為此文重要貢獻如後：就戰國史而言，史家咸認為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方奠定強盛基礎；何院士則登高致遠，直指秦獻公才是其中關鍵。他在文中開端以歷史文獻如《水經注》、乾隆（1784）《韓城縣志》，結合近代歷史地理學者的研究，從河西地貌揭示戰國初期的秦魏之戰的歷史意義，秦獻公即位之初的嚴峻形勢，以及其如何藉墨者之助扭轉局面，落實一系列軍政新措施雪恥圖強，商鞅變法不過順其勢而弘揚，凡此俱為研治戰國史學者多所忽略，



圖四：與楊振寧伉儷、張立綱教授及《二十一世紀》同仁合影（約 1993 年）

引自《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 1949-1997》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頁 164-165。



圖五：一九九八年，在黃帝陵古柏下與長子可約合影

引自《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

幸賴何院士心細如髮，發前人未發之覆。就墨學研究而言，晚清以來，墨學復興，名家輩出，在文本考訂、思想史，以至軍事史等領域俱有相當建樹。唯何院士另闢蹊徑，點出前人在墨學這一領域尚未能圓滿解決的問題，如鉅子制興替始末、秦墨在秦國變法圖強中的作用，以及墨家集團的命運——走向湮沒無聞，推陳出新，提出卓見。鉅子制前人雖有所探討，但因史料所限，語焉不詳，點到即止；何院士雖受同樣制約，唯因充分發揮史家技巧，以《呂氏春秋》幾條相關記載為定錨，逐層剖析，從人所周知的史料切入，卻能化腐朽為神奇，編織出一幅人所未悉的歷史圖像，提出目

導航：
一切皆以實心本校核，至求至善！已細核三次，打字打字
很好，請代我向打字小組致意。
本意以奉獻，但怕太寒酸，也未能印出你全集，所以決
定再航郵了。
中，英文摘要日內當訓'標。此外仍為舊書目(引用的)
這些我都在該自己理出。
漢語及語所核對的認真，這是非常重要的。大陸
核對就很糟，而且重要徵引文和文章正文混在一起，
看起來，或者求費力。原社不少大陸期刊都印在
正文之後，或者隨頁的零散，看起來也很不方便。所以
以後我嚴肅的文章都是大陸大陸。
就靠每節早印，細文正式核'你，大概以并一二月
商店與問題。社里《史語所集刊》刊出，
也是件好事，非刻未免太'奇'了。
祝

懷祺，每節佳勝

何炳棣

2005年12月21日

圖六：何院士手札原件（2005年12月21日，影像作者提供）

前為止最為周延的探討。至於墨家湮沒的原因，《莊子·天下》篇及《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所言，俱有相當道理，見解卻不如何院士從正反的異化辯證角度點出墨家與統治集團關係演變那樣鞭辟入裡。文中最後以漢宣帝一段話及毛澤東詩作為總結，畫龍點睛，更能彰顯課題的歷史意義。

何院士謙稱自幼因長篇背誦工夫太少，全不涉及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國學基本工具，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寫作幾乎都是質勝於文、理勝於文，自恨從來沒有下筆萬言流暢自然的才氣。」^⑩ 管見認為書中所收的歷史論文，確是「理勝於文」或「質勝於文」，唯就涉及文學領域的〈從愛的起源和性質〉一文所見，文中遣詞、用字、造句饒富文采，茲摘錄其中一段以見一斑：「亞當入世初醒，睡眠惺松之際，已發覺四周有平疇綠野、丘陵鳴泉、林木垂蔭、百花錦簇、仙果纍纍、甘芳欲滴，真如原詩屢度綜述，色（sight）、香（smell）、味（taste）無不具備，供他摘食享用。動物方面，猛如獅虎，馴若麋鹿，莫不和祥共處，各自成雙，嗅吻狎昵。好一派春日遲遲，懶洋洋單身漢奈何不得的醉人情景！」

何院士自承是個相當「傲慢」的歷史學家，史學界每以「目空當世」或「目無餘子」來形容他。^⑪ 唯就書中所見，對論著成果確有貢獻，或對其研究有所助益的前輩、同輩，以至晚輩學人，他都一一予以稱道。即便西方著名漢學家及人類學家 Berthold Laufer 於一九〇六年所發表的“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一文，何院士認為雖是史料不足，不熟悉原始史料，不免錯誤和偏激之見的不成熟之作，但已顯出作者「治學的魄力和權衡輕重的能力」。這樣不吝對他人長處予以慷慨肯定及欣賞，尊重前人業績，足證何院士具有十足的安全感。

最令人感動的是，從何院士二次榮退，到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二十多年間，委身於一個新領域的基本大課題研究，奔波於圖書館查證史實及蒐羅史料而外，其間所撰論文每字都親自下筆為之，從不假手他人。如背後沒有堅強及驚人的毅力及與意志，特別是感情的驅力，這些論文實無可能以目前面貌出現。一些論文如〈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及〈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何院士更是精益求精，不憚一再修改。他以「老驥伏櫪」來形容這一階段，先秦思想攻堅所作的努力，實在貼切不過。書中博大精深的多面性研撰，引領後學徜徉並穿越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領域攻堅的成果，雖尚不足以成為定論，但今後研治這方面的學者，或不贊同

^⑩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8。

^⑪ 全上，頁334, 349；「何炳棣日前到台，將去香港，晚王雪艇〔世杰〕宴之於南港，論及美國之漢學家，頗乏好評，渠一向目無餘子也。」見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697，1966年12月26日條。

何院士所說，勢不能迴避書中相關論文的論點。就本書所見，筆者察覺何院士尚有如〈董仲舒宦業繫年考辨〉等待刊文稿，企盼及早整理出版，嘉惠學林。在古往今來的萬古歷史長河中，儘管這位真正的學術巨人遽然逝去，他畢生耕耘的成果當能經得起時代考驗，永垂久遠。

後記：本文承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卜永堅先生提供影像檔電子資料（見圖二及圖三），謹此致謝。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定稿。